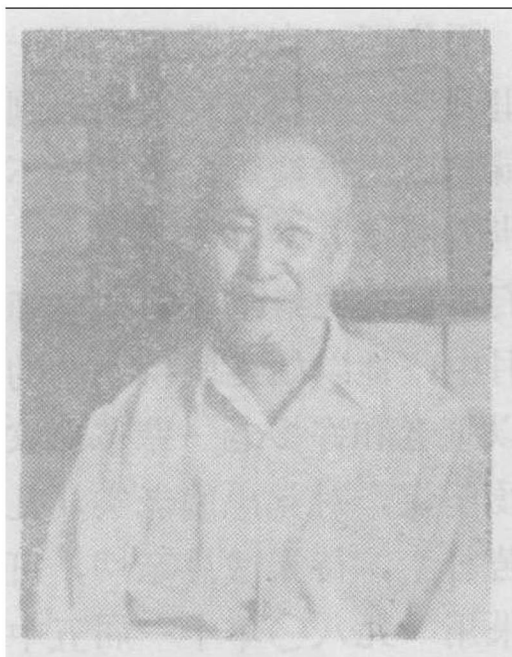


自述

谢国桢



承同志们友好的关怀，要叫我写一篇自传，这是同志们的盛意。可是我自己审量自己，我从小就愚钝，而且是少不努力，以至于皓首无成，真是没有什么可以写的。无已，我只有不隐讳自己，说几句老实的话吧。

我出身于没落官僚地主家庭，家庭中的长辈们都是以做官为荣，要当个书呆子在家庭里是根本没有地位的，故家庭中人叫我“大傻子”。可

是我出生于1901年4月，在我的家庭中是一个长孙，祖母朱太夫人喜得看见孙儿了，我就为她老人家所溺爱，起个小名，叫做“大保”（“宝宝”的意思），百般地爱护我，抚养我在屋子里，不叫我出去乱跑，因之到六岁的时候，我还不良于行。但我的祖母喜欢每天晚上在灯下给我讲故事，教我念《诗经》和《唐诗三百首》、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的诗句。我所以爱读文史，或者导源于此吧。不久，我的父亲为我请了一个家庭塾师，教的很不起劲，懵懵懂懂的读“四书”、《诗经》，真是“读《中庸》屁股打得鲜红”！当时正值清末民初的时候，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从报》风行一时，我很佩服梁的为人，就问过这位老师：“我学梁启超好吗？”老师回答说：“你怎么配学梁启超呢？认得几个

字，学习的文字通顺，能写‘八行书’（指为人作幕客写信）就够了。”我的父亲是以游宦为生，挥霍成性，不久有了外室，把我的母亲和我们兄弟二人（胞弟国栋）置之于不闻不问之列。但我的母亲终究是他的正室，因之但看见“追赔公款，缒骑到门”，也只有向我的胞叔们作“将伯之助”，代为赔款了事。到了我十八岁时候，1919年春天，我们兄弟二人，从家乡河南安阳来到北京上学。因为只学了些“学而时习之”的东西，英文、算术一窍不通，虽然上了北京汇文的大学预科，但想上北京大学的文科，连次投考，时历三年，都考不取。前途茫茫，没有希望，从事学问一道，真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只有望红楼以兴叹，见沙滩而增悲。幸承桐城吴北江（闾生）先生的教督，学习古诗文辞，并介绍我做家庭教师，生活有着，得以半教半读，在1925年夏天终于考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而且侥幸名列榜首，承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先生的教诲和指导，从事研究历史，尤其是明清史和目录学，得以稍有门径。从这时起直到今天，这是我五十多年来一直遵循着的道路。我以教学和科研为生，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26年我在清华结业之后，随梁任公师到天津他家“饮冰室”，教他的子女梁思达、梁思懿等人。次年，梁先生介绍我到南开中学任中文教师，他的子女也到南开中学肄业。梁先生逝世之后，我也因梁先生的关系，到北京图书馆担任编纂兼金石部收掌之事。由于梁先生的亲授，我的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搜集明清之际的资料，以及建筑园林的史迹，皆于此时完成。其间曾到江浙，北上大连、沈阳，东渡日本访求遗书，写成了《晚明史籍考》一书。1932年承胡适、傅斯年介绍，到南京担任前中央大学专任讲师。次年该校介绍我到河南大学任教授，我没有去，可是叫我协助他们编《河南通志》，因之仍返回北京图书馆供职。在南京期间，于梅庵之旁教习房中著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表问世，廖承鲁迅和柳亚

子先生所策励和奖掖，实在是始料所不及。这些工作多是1936年以前在北海琼岛之滨、太液池旁做的。

(2)1937年到45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关东军侵占我国华北领土，北平沦陷。是年秋，我曾到长沙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供职。1938年春，中华文化基金会孙洪芬先生叫我返回北平典守北平图书馆的金石图书，因之又回北平任职。在这以前我本来为中日庚款基金会所办的东方图书馆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一书，因为某种关系，周作人就延聘我到伪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我还错误地认为站在红楼上，“楼犹此楼也，土犹此土也”，大讲其祖国的历史和“华夷之辨”的事迹，实在是失去了民族气节。因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勒令我辞职，我只有承傅增湘先生的好意，经他介绍我到川帮私营大中银行聊司笔札，并协助傅沅老编纂《绥远通志》一书，这也不过是混些事儿和遮耳盗铃而已。这些事情我不说，人们也会知道，我不如坦白的交代出来，作为一篇反面教材，供同志们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已。

(3)1945年秋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仍在北平临时大学任教。1946年春，我的父亲在河南安阳病危。时军调处业已成立，承周扬同志盛意介绍，得以通过解放区到安阳去省亲。在邯郸道上遇到旧识范文澜同志，又得认识杨秀峰同志，真是“白首如新，倾盖如故”！他们托我到上海时为华北大学购买图书，想不到萍水相逢，授以重任，并为我医治好了病，不觉热泪盈眶，感戴不已，旧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无形中流露出来。当我回到安阳，我的父亲业已故去，我就由郑州迁道上海，把为华北大学购买的图书，包装妥善之后，由马思南路的周公馆运回到解放区。我仍在上海大中银行供职，并在开明书店编写稿子。承叶揆初(景葵)世丈借给我他所藏的严修能批校、杨凤苞校注的金祖望《鲒埼亭集·内外编》的稿本，我就在上海河南路一角小楼上，开始校辑《鲒埼亭集校注》一书。那时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役已经展开，我就为开明书店编著《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一书。

须知我这些不成熟的作品，不是写于象牙之塔，而是写于十里洋场的十字街头！到1948秋，承钱穆先生介绍我到昆明云南大学和五华书院去讲学。1949年2月北平解放，我就由昆明回到上海，从镇江潜渡长江回到北京。见到范老，范老叫我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去学习。这年九月，没有结业，因为工作需要，我就被推荐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

(4)从1949年10月到现在。先在南开大学教授明清史、目录学、历史文选等项课程，曾担任过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不久郑天挺先生来到南开，同教明清史这一门课程，于教改期间，得到他不少帮助，使我思想上有了条理，教学和写作上也有所进步。1957年底，我由南开调到历史研究所工作，一开始就参加运动和改造思想，虽然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可以从事于科研工作，可是由于我懒惰成性，没有抓紧时间从事于明清史的研究。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我隔离在一间屋子里停职反省。因为我感激党和毛主席，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纵然受到冲击，也在所不辞；况且又有这样悠闲的岁月，正是读书的大好机会。我想到改造我的思想，莫如读“毛选”和《鲁迅全集》，并可以借此来学习我的业务，补足我的缺陷。于是我就想研究汉代史迹，读两“汉书”、《东观汉记》以及《三国志》等书。又于读鲁迅先生杂文中在研究史学上得出两点体会：一是鲁迅先生指出读正史不如读野史笔记等书有益，因为作者不是史官，不摆史官架子，多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二是从汉代石刻画像中，可以看出汉代社会的生活面貌。从此我就沿着这个轨迹，把这个作为我后半生研究学问的方向。近十年来，晨抄夕纂，我就编成了《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以及《两汉社会生活概述》等书，但还是粗制滥造，不够标准，有赖于读者指正。

下面我要简略谈谈我的思想和人生观。我一生浑浑噩噩，缺少圭角，有些傻气。又由于受到腐朽家庭的种种压抑，为了挣扎、要强、争面子，养成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而做了些争名逐利

的事情，甚至犯了很大的错误。又由于我吸取了一些教训，加之禀性怯懦，事事不敢出风头、露头角，也不喜欢凑热闹、随声附和，在个人名利上更是避嫌，而是一心一意、呆里呆气埋头于读书做学问，因之建国后在大的运动中我没有出问题，当然在学术上也没有取得十分显著的成就。但是日子长了，到了老来，有些同志还说我思路颇清楚，见闻颇博洽，还能写几篇文章，写几个不高明的字，认为是做了有益的工作，这是群众对我的策励。从而我深深体会到：要相信群众和相信党，要摈弃个人主义；离开了群众和党，个人什么事情都是做不成的。

复次，略谈我的治学方法。我一生在良师益友教督之下，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明末清初的历史。我试图研究满清未入关前的史迹，因而上溯到渤海、辽金、蒙古以及秦汉时代的我国东北的历史。又因为在图书馆做事，就想学习版本学，尤其想学习为研究学问指明道路的和提供资料的目录学。但是因为我懒惰成性，又撙于人事，奔走南北谋求衣食之故，这些事情都没有做成，从“三十而立”之年起，到现在，这六十年来，碌碌得很，只写了一些粗造的不成熟的作品。至于我研究学问的体会，我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它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总的说是与政治分不开的。因此，研究历史必须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具体事实作具体分析。又因为历史是一门科学，那就要有一套研究的程序和方法，“论从史出”，掌握了足够而可靠的资料和论据，然后才能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所谓研究的程序和方法，首先要具备某些历史学的基本常识，所谓“胸有成竹”，然后才能识竹，这样才能具有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考证、鉴别、辑佚和辨伪的功夫。也就是说，对于史料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得出正确的结论，才可提供给史学界探讨。因之搜集历史资料也可以叫做史料学。至于研究学术所应做的功夫，如研究某一部历史巨著，必须订补足原书的罅漏和书中字句的错误，然后采取综合演绎推论

的方法，加以归纳，才能够恢复原作的面貌。可是我认为光是运用这些形式逻辑的方法还是不够的，还要采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古人说得好：“读书得间”，就是从空隙中看出它的事实来，从反面可以看出正面的问题，读正史外，还要从稗官野史中搜辑资料从事订补考证，这犹如阳光从树林中照在青苔上，斑驳的光亮可以多少反映出客观的现象，从而得出这些事实的一个侧面，然后取得内在的联系，积累了许多的专题研究，然后才能写出不是陈陈相因、抄撮成书的作品。这是我治学的一种想法。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有待于同志们和方家的指教。

我写的这篇肤浅的文字，不叫《自传》而叫《自述》的原因，是念及在刘宋时代刘孝标著有《自序》，到了清朝汪中而作《自述》，他以为自己不如汉代冯敬通者有“三同四异”。我是想学习全祖望的史学的，但我感到的是，不但不如，而且对之增愧。

一则，谢山传浙东学派，热爱祖国，当清朝文字狱繁兴之时，不畏强御，不怕杀身之祸，于南宋和明清两代史事，存亡继绝，赖以得传，开有清一代研究历史的风气，并世人文难与抗行。余则丧志辱身，几至失去民族气节，对之汗愧。

二则，我治学粗浅，谢山学识之博大精深，实不能望其项背。后来能补苴谢山罅漏，而拾其菁华、芳草的，若杨凤苞、叶廷琯诸君。继谢山之后能补证其未备，余实在是望尘莫及。若我的前辈孟森先生对于明清史学做出了颇多贡献，我也难乎为继，仅效法他早年所写的《心史丛刊》搜辑有条理有秩序的资料，敷衍其事而已。研究明清史是当前一门重要的学问，好在后继有人，方兴未艾，正有待于来者。

三则，谢山先生治学的方面很广，所取得的成绩很大。我认为自有清降及近代的学者，若全祖望、龚自珍和王国维先生皆博大精深，开辟蓁莱，启发治学的先河，实为近二百年来的朴学大师。楨虽受业于王静安先生之门，又承吴北江、梁任公师之提携，而扪心自问，甘于下流，垂老无成。实在是愧师门。

但是我也有窃自幸喜的地方，有两个方面：

谢山先生生于清朝专制时代，文字禁网之下，因为得罪权贵，被黜出京，一身贫困，卖了心爱的书籍，才能整饬行装，踉跄出京，著有《春明当书记》一文；桢则幸生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盛世，从事于教学研究工作，得读书春明，悠游南北，文津阁、天一阁之书资我阅读，其幸一也。

谢山先生屡遭蹭蹬，发愤读书。贞坚自学，百折不挠，卒以忧劳成疾，年未能登中寿；而桢痴愚成性，秉性乐观，遂至玩时旷日，垂老无成；然读黄宗羲先生之语，绝无“伤贫嗟老”之心，所以虽然头童齿豁，而犹能学习，诵读不辍，其幸二也。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草于沪渎，返京后又加以修改。时年八十有一。

谢国桢著述目录

顾宁人学谱 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解放后再版改名为《顾亭林学谱》。

黄黎洲学谱 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解放后再版。

孙夏峰、李二曲学谱 1932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晚明史籍考二十卷 1933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1964年增订，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

清开国史料考六卷 1932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中华书局修订后再版。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1934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中华书局近将再版。

清初史料四种 1935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辑《明代边疆之书》 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吴大澂尺牍 1936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 1948年开明书店铅印本。即将收入论文集内，改名为《清初东北流人考》。

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 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铅印本。即将修订四版。

南明史略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将修改再版。

明清笔记谈丛 1962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即将再版。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三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铅印本。

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二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待印。

(以上二种均辑录明清时代野史笔记中的资料)

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陕西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

两汉碑刻砖瓦拓本集录 北京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整理影印。

明末清初的学风(论文集) 人民出版社待出版

江浙访书记 三联书店整理待印。

史料学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整理待印。

黑龙江通志稿艺文志 黑龙江通志稿铅印本。

河南通志稿艺文志 仅有存稿。

绥远通志(呼和浩特)民族志 河套民族变迁考 1943年中和杂志抽印本。

明港纪事诗二卷 在明港五七干校所著稿本。

三吴回忆录 1943年董鱼编辑印本。

两粤纪游 1936年禹贡杂志社单行本。

锦城游记 1963年讲学四川大学所写(稿本)。

腾冲县图书馆馆藏的善本书

腾冲县是滇西的边区城市。该县图书馆收藏有多种珍贵古籍，其中有几种善本书尤为名贵。

一、元版《玄玄棋经》 元晏天章、严德甫合著，元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刻本。原系该县藏书家张木欣所藏。

二、明手抄本《古今石刻碑帖目》二卷三册 明周弘祖撰。周弘祖是麻城人，嘉靖进士，著有《古今书刻目》与《古今石刻碑帖目》。该书著录国内名碑五百余条，并注明碑的所在地。该书最末一行《瓦博亭碑》，据收藏家陈士可考订，系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竹汀）后来所增加。

三、清代禁书《天盖楼四书语录》、《四书讲义》 明吕留良著。吕留良是有民族气节的著名理学家。他的著作在清初文字狱中都被禁毁。他的这两种著作是历经满清文字狱的灾难而幸存下来的书，故弥足珍贵。这两种书是他阐发《四书》理论的姐妹作，是研究吕留良思想的重要文献。

四、手抄医方集《鬲疴玄方》收录江、浙、闽、赣四省的内外科医方五十四方。钤有“张玉麟”的朱色印，据考订该书为张玉麟游学长汀、赣、州、镇江、与杭州等地所得奇方的汇集。该书体积颇大，约一尺见方，装帧古朴，风格与常本迥异，是一本罕见的医方抄本。

· 腾人 ·